

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

——《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中不可靠叙述之比较

郭宇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44)

【内容摘要】“不可靠叙述”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并产生了修辞研究和认知(构建)研究两种研究方法。本文试在修辞研究的视野下比较《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中的不可靠叙述,并指出:在这两篇小说中,不可靠叙述呈现出相同的审美特征,即不可靠叙述的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而这三个特征与“不可靠叙述”的三大类型又产生了契合,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叙述效果,深化了批判的主题。

【关键词】不可靠叙述 狂人日记 火车上的食人族 修辞研究 叙述效果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7)06-0116-04

鲁迅的《狂人日记》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火车上的食人族》这两篇小说在具体的文本中体现出了许多相合之处,最为突出的就是它们都运用了不可靠叙述的手法来展现“吃人”的主题。“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又称“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阐发,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修辞方法和认知(构建)方法。本文将从修辞方法的角度阐释不可靠叙述,修辞方法视野下的不可靠叙述是由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其经典著作《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961)中所创立的概念,并将不可靠叙述分为两大类。修辞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在布斯的基础上将不可靠叙述归纳为三大类型或三大轴,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了六种亚类型:事实/事件类中的“错误报道”与“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类中的“错误判断”与“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类中的“错误解读”与“不充分解读”(最后一类是费伦所增加的)^{[1](P49-53)}。在这两篇小说中对这几个类型均有所涉及,因这几个类型的存在,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显现出了三个相同

的审美特征,即不可靠叙述的明确性、反讽性与可逆性。本文通过分析与比较两篇小说中这几个特征指出不可靠叙述这一叙述策略对小说主题的揭示与深化所起到的修辞层面上的积极作用。

一、不可靠叙述的明确性

一般来说,作品中的不可靠叙述都处于比较隐晦的状态,需要读者通过细致的阅读去辨认,但是在《狂人日记》与《火车上的食人族》这两篇小说中,却明确地指出了叙述的不可靠。不可靠叙述的这种明确效果可以归功于对双重叙述的运用。“双重叙述”顾名思义指作品中出现了两个叙事层次。这两个层次有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一是平行式,即两个层次是同时进行的,可以有交叉也可以互不干扰,比如马克·吐温的《亚当夏娃日记》就是分别以亚当和夏娃的视角所写作的日记作为小说的主体;二是引套式,意味着二者是引发与被引发的包涵关系,一个层次的叙述可以引出第二个层次的叙述,而第二个层次是包含在第一个层次叙述之内(或之下)的。在本文所讨论的两篇小说中的双重叙述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

在《狂人日记》中,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语

* 作者简介:郭宇(1985—),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研究。

选制的残忍时却指出这个情况是虚构的，所以即便读者已经对真实的民主制度进行了批判，但多少弱化了批判的力度。

二、不可靠叙述的反讽性

前文所说不可靠叙述的三大类型“在有的情况下会构成因果关系”^[2]，在这两篇小说中，事实/事件类中的“错误报道”是由知识/感知类中的“错误解读”或“不充分解读”所造成的，并使得不可靠叙述与可靠叙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鲜明的对比能够起到强烈的反讽效果，在此，不可靠叙述获得了明显的反讽美学特征。相较两部小说后不难发现，两部作品都是通过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的强烈对比来达到反讽的叙事效果，从而深化其批判的主题。

《狂人日记》里，狂人“我”的叙述大部分是不可靠的，但其中也掺杂着可靠的内容。由于日记是“我”“发病”时所写，所以“我”叙述的内容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认知。比如狂人上街时看到别人看他，他感到“赵贵翁的眼色便怪……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3]在此处，其他人议论“我”和看“我”的眼神怪异的叙述是可靠的，因为大家知道“我”精神不大正常，所以自然会以异样的眼光看“我”并议论“我”的情况。但是“我”描述对其他人的感受时则是不可靠的。“我”觉得别人的眼神是想要害我的眼神，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此处的不可靠叙述便是对客观事实的错误感知造成的。又如，“我”病的很严重，对大哥说起吃人的事情时有邻居们来看热闹，大哥对那些看热闹的人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4]在此处，“我”说吃人的事本身是不可靠的，大哥说“我”是疯子则是可靠的，因为“我”的言行在其他人眼中就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的表现，但正是疯子发现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而那些思维正常的人却对此毫无觉察。另外的一例不可靠叙述使内容获得隐喻的性质。由于“我”患病，大哥便找来医生为“我”医治，该叙述是可靠的。但是在“我”看来医生却是“刽子手扮的”，这里的叙述则是狂人的臆想，是不可靠的。在这可靠与不可靠叙述的对比中，医者的

言表达形式，开头和结尾处的文言文是第一个叙述层次，其叙述者为“余”；小说主体的白话文是第二个叙述层次，叙述者为“我”。“余”在文章开头指出该文是其友人之弟在患“迫害狂”之类的病症期间所写的日记，由此引出了第二个叙述层次的“我”。既然“我”是“迫害狂”，则说明“我”所说的内容不可信，亦即日记内容的不可信。根据“余”的介绍读者可明确知晓“我”的叙述是不可靠叙述，“我”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因此不可以将“我”说的话当真，也就是不可以将日记的内容当真。在《火车上的食人族》这篇小说中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叙述者“我”的叙述是第一个叙述层次，“我”在车上碰到了一个前国会议员（以下简称为“议员”），该“议员”的叙述是第二个层次，也是小说的主体部分。小说在结尾部分揭示了“议员”是个神志不清的偏执狂，由此否定了议员之前所有叙述的可靠性。作为一个神志不清的人，议员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其叙述内容自然不可相信。

这两篇作品都通过运用双重叙述的手法明确强调了作品中的主要叙述者“我”与“议员”的叙述是“错误报道”，属于在事实/事件的范畴内直接地否定了叙述的可靠性，使得此处的不可靠叙述具备了明确性特征。这种不可靠叙述的明确性在引导读者去关注文本中的真实与虚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有效地推动甚至是强迫读者不自觉地对“真实”进行思考。《狂人日记》开门见山地指出狂人“我”的说辞不可信，读者因而在阅读的过程中都会将所读到的内容视为“虚构”，然而具有隐喻性质的“吃人”，特别是从“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的“吃人”则易令人产生“真实”的联想，肉体上的“吃人”虽然不可信，但精神上的“吃人”则是可行的，所以也是可信的。由此，不可靠叙述中出现了真实可靠的内容，在这种强烈对比中深化了批判的力度。《火车上的食人族》一开始隐瞒了议员叙述的不可靠性，误导读者以为议员所言不虚，进而使读者联想到现实世界中的民主制度，并发现其残忍虚伪的吃人本质。及至结尾，又令读者恍然大悟其叙述的不可靠性。相较《狂人日记》而言，这篇小说的批判力度有所削弱。作者在读者都已经相信并且抱着批判的态度看待民主竞

形象获得了隐喻的涵义。医者本应治病救人,但他却成为了害人的一员,而他的害人行为比之恶人的害人行为更令人发指,因为这意味着没有了医生,疾病便无法被治愈,痛苦与灾难便得不到终止。

《火车上的食人族》与《狂人日记》有异曲同工之处,马克·吐温也通过不可靠叙述的反讽性表达真实的创作意图。议员的叙述中也充斥了可靠与不可靠的部分,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的认知。在议员所讲述的故事中,由于遭遇风雪,火车上的人在弹尽粮绝之后决定吃人。这些来自社会上层的人们通过民主选取的方式来选择要吃的人。对选举的过程,如提名、申辩以及投票等都是真实可靠的叙述,因为美国当时的民主选取机制就是这样操作的。而对具体的吃人过程的描述则是不可靠的,因为议员并没有真的经历过吃人的事件,这都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小说中议员的错误感知与正常人的正确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可靠与不可靠叙述的对比对美国民主制起到了反讽的效果。民主制本应带来合理的对人的生活起到积极作用的决议,但是在火车中,通过民主制投票的结果却是把活生生的人剥皮生吞,将人引向死亡。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得不令人反思民主制的内在本质。

三、不可靠叙述的可逆性

三大类型虽然有时可以构成因果关系,但相互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在有的情况下,在一类中的不可靠叙述在另一类中可能就成为了可靠叙述。“在有的叙事作品中,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间的界限不会非此即彼地表现出来,而具有更多动态变化的意味”。^[4]因此,不可靠叙述体现出了可逆性特征,而这一可逆性审美特征恰巧有利于读者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隐含作者——进行正确的理解。隐含作者是与不可靠叙述密切相关的概念,创始者也是布斯。布斯认为:“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5]P159}由此可知布斯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就是作品的规范(norms)。而这个所谓的“规范”则是指作品中的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5]P73-74}简言之,叙述的可

靠与否要根据作品的创作意图去判断,符合创作意图的即为可靠叙述,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因此隐含作者的态度也是不可靠叙述出现可逆性特征的基础,同时也可以通过对不可靠叙述的可逆性分析来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

在本文所讨论的两篇小说中都出现了可逆性特征,且均与价值/判断类相关。前文提到的有关错误报道与错误感知的不可靠叙述在价值/判断的类型中由不可靠转变为可靠,亦即由错误判断或不充分判断转变为正确判断与充分判断。鲁迅的《狂人日记》着力表现了狂人的疯狂,强调了其非理性的世界,因此表明了狂人叙述的不可靠性。但作者强调不可靠性的用意却在于将狂人和正常人的可靠作对比,由此突出狂人在“疯狂中的清醒”以及“对旧有秩序的反抗”^[6],狂人之所以“胡言乱语”是因为他发现了他所处的社会的吃人本质,他的这一价值判断与隐含作者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这里的叙述虽然在事实方面而言并不可靠,但是从对社会的理解与认知的角度看却是完全正确的。而狂人的这种“清醒”与“反抗”本该是正常人所拥有的,但正常人却没有。如此一来,文本体现出了对比的张力,使读者意识到不可靠的疯人的“可靠”之处,以及可靠的正常人的“不可靠”之处。这里的“可靠”与“不可靠”产生了逆转,由此作者表达了对能够推翻旧社会旧制度的狂人的呼唤,并显露出其内在的唤醒麻木民众的启蒙意图。在《火车上的食人族》中,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按照理性的逻辑思维来说,作为掌握一国命脉的政治家应该是理性而又可靠的,民主制度也应该是现代的、文明的,并为人的生存提供保障的制度,但是在小说中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小说中的议员是一个疯了的政治家,其叙述充满了非理性的叙述,与理智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议员口中所叙述的民主选举的制度也沦落为进行原始的、野蛮的为了生存而吃人的工具。作者通过这种对比突出了民主制和政治家不可靠的一面,试图使读者意识到议员的“疯语”中的可靠性判断。因此,不可靠叙述转变为可靠叙述。本文直指美国民主制度及其参与其中的政治家,表达了“个人对社会的不满以及担心被吞噬的焦虑”^[7]以及对美国社会堕

落的痛心。马克·吐温是一位关心时政并敢于揭露的作家,然而基于各方面的原因,他迫不得已成为他自己曾不屑为伍的人们中的一员,开始言不由衷地写作。他认为自己是美国社会最后一个真正诚实的男子汉,但如今也沉沦了。^[8]因此,在吐温看来,美国社会中的正常人是敢说真话的,唯有那些失去理智的疯人才敢言常人所不敢之语。所以作者通过不可靠叙述与可靠叙述的可逆性效果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扭曲的社会与制度的批判。

两篇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呈现出相同的美学特征并非偶然,相似的背后有着相合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文小说,有着明确的文化与政治上破旧立新的目的,由于其敏感的政治倾向性,故在小说的表达上趋向于含蓄。而《火车上的食人族》所出现的时代是美国民主制已经颇具根基的时节,因此在批判时不得不考虑到政治当局的因素。另一方面,不可靠叙述的明确性可以引导读者关注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的对比,进而意识到因对比所起到的强烈的反讽效果,由此关注“真实”与“虚构”的关

系,并思考到底什么是“真实”。因此,在最后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读者可以辨别出不可靠叙述的可逆性特征,将不可靠叙述还原成可靠叙述,产生与隐含作者相一致的价值与道德立场。由此,作者的创作目的达成。

参考文献:

- [1] James Phelan,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 申丹. 叙事、文本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3] 鲁迅. 鲁迅小说全集[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
- [4] 谭君强. 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6).
- [5] 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 [6] 钱理群等著.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7] 朱振武主编. 火车上的食人族——马克·吐温短篇小说(评注本)[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 [8] 马克·吐温著, 谢森译. 马克·吐温自传[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